

六合叢書

蜗耕集

张 治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六合叢書

蜗耕集

张 治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蜗耕集 / 张治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308-09805-2

I. ①蜗… II. ①张… III. ①翻译—语言学史—中国—文集 IV. ① 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4632 号

蜗耕集

张治 著

策 划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 www.zjupress.com](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25千

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805-2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丛书主编

吕大年 高峰枫

目录

“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	1
人名难译：从周作人与罗念生的分歧说起	7
伊比利亚的倾国闲话	14
文学中的力：詈词与秽语	22
“列举”法的修辞学技艺与《巨人传》的翻译	29
《三洲游记》小考	36
林译小说中的两部儿童故事集	43
最早“转贩”西方中古文学的林译小说	51
《红星佚史》与《金梭神女再生缘》	58
中西“食蝗”小史	75
钱锺书读“娄卜”（一）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篇	80
钱锺书读“娄卜”（二）	
——奥略·葛琉斯《阿提卡之夜》篇	87

钱锺书读《堂吉珂德》 93

文献考据与文学鉴识：西方古典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精神 105

当翻译变成喜剧 116

西方历史学进入中国的开端

——评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 127

不识风月读小白 138

六卷本中译简体字版《罗马帝国衰亡史》商榷 144

近代史的掌故学 154

晚明耶稣会士的证道故事 161

伊朗古史的“去希腊化” 168

我们今天如何读但丁《神曲》

——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本科学生演讲文稿 177

“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

在小说《围城》里，形容方鸿渐对于到三闾大学任教的畏惧，钱锺书用了句俏皮话：

在西洋古代，每逢有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

这句话本自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哲学家芝诺比乌斯（Zenobius），已见于钱定平的《破围》。按芝诺比乌斯的原话直译大概是“告诉你：他要么死了，要么就是教书去了”，本是句短长格的诗体箴言。芝诺比乌斯生活在哈德良皇帝的盛世（117—138）中，有关他的生平，后人了解得不多，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不少博学鸿儒（比如伊拉斯谟）还记成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大学者芝诺多图斯（Zenodotus）的名字。我们只知他编写了一部箴言集，还将萨路斯特的拉丁文历史著作翻译成希腊文，献

给崇敬希腊文化的罗马皇帝。《箴言集》按句首字母为序，一共 552 条，每 100 条一组，最后一组仅有 52 条，上述这句名言即出自此书第 4 组第 17 条。还有以赛亚·伯林那句大名鼎鼎的较狐狸和刺猬本领的话，也是本自此书第 5 组第 68 条：狐狸多谋，而刺猬仅一招就可奏效（不过芝诺比乌斯坦诚地告诉我们这句话原出自荷马，据考证，当是那部亡佚了的作品《玛耳基忒斯》[*Margites*]）。

《围城》这部小说有其时代的主题。既然动笔于 1944 年的上海，未必不包含从沦陷区的现实环境中萌生出的构想。世人知道“围城”的西方典故，什么鸟笼子，什么攻城和守城，这都不谈了。“围城”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典故。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人中岛长文访问钱锺书，询问围城之名的由来，钱锺书就把《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里一段话指给他看。这话原来出自《战国策·赵策》的，鲁仲连是齐国义士，游侠到赵国，当时邯郸被秦军围困，有人劝降，鲁仲连坚决反对，平原君有个门客是劝降者，曾疑惑于鲁仲连的动机，问他：“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这就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意思了，钱锺书夫妇在民族危难时返国，从此不动旅居海外的念头，不会奴颜婢膝于傲慢的侵略者，也绝不是有求于未来的政权，正反映在这个微妙的典故中。日本人后来很忌讳这个中文名，翻译的时候便将小说题目改作了不伦不类的《结婚狂诗曲》。由此来看，《围城》应该有极为切

合现实的关怀。“虚构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小说中的人物在战乱年代深入内地去教书的情节，大体合乎作者本人的经历。1938年，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执教，钱锺书甘愿前往该校工作，为的就是照料老父。他临行前给友人的赠诗里说：“已丁乱世光阴贱，转为谋生性命轻”（《叔子赠行有诗奉答》，“丁”作“值逢”解，如《颜氏家训·序致》：“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可见他是很明白前路之危险。连《谈艺录》中都忍不住说起当时途中“形羸乃供蚤饱，肠饥不避蝇馐”的惨状，其小说《围城》怎么可以反倒是毫不动容呢？“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在我看来，正是道中作者的隐衷。

钱锺书用突降的修辞法，把庄重悲凉的话语拈作谐谑之言，很叫中国读者们不能察觉其蕴涵的意味。钱定平对这句话的“妙评”是“讲台如战场，叫人心惶惶”，只瞧见了方鸿渐的窘态，总有些隔靴搔痒。我们还需回到西洋典故之原本历史背景中去，芝诺比乌斯在此条箴言之下，撰有按语，大意谓雅典人不堪战乱之苦，受制于征服者（他原话指的是“西西里人”，恐怕是借叙拉古之旧账来“以古讽今”）的武力淫威，许多囚犯到战胜国去教人子弟读书，偶有故人还乡，谈起亲友之现况，无非“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

家国虽亡，然而文化不灭，不仅是不灭，反而是得到了更多的赞助和扶持。哈德良皇帝及其所开启的安敦王朝诸帝（138—180），全都嘉赏希腊的文化与学术。然而检阅学术史，

此时期高水平的学术成就全都出现在埃及，“大希腊”地区多的是只会摹拟古典文辞的史学庸才，痴迷于抄录生僻词汇来冒充学问的“语法家”（这里的“语法学家”就是 Grammarians，也可指教书先生，箴言中“教书”一词与之同源），还有誓死捍卫古文辞的“阿提卡风”修辞学家。曾在地中海世界辉煌一时的希腊民族，堕落至除了替人家作“保傅”、教育黄口小儿诵读荷马史诗外别无生路的地步，真是叫人心生感慨。这时叙利亚有个玩世不恭的文人琉善（或叫做卢奇安、路吉阿诺斯）出世，写了许多煞风景的讽刺文章，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批评得非常激烈。他谈历史学的文章，今天被拿来与刘子玄的《史通》相发明。琉善还造了个叫 Lexiphanes 的字眼儿，意思是“炫耀生僻词汇的人”，就是讽刺那些语法学家。他对于当时的古典文学教育尤其不满，认为那些老师对于传统已经不再用心。且不论琉善自己有多么纯正的古学根底，至少他这种悲愤的热肠，是很感人的。据说，这位讽刺大师最后是被狂犬咬死的，可见是如何的“世人皆欲杀”。

然而即使是坐稳了教席，活得也不舒心。统治者对文化传统的看重是为了粉饰点缀，其中真正传承道业者则是痛苦的牺牲品。最近重看《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八十一条，专记读罗马帝国时期的学者奥卢斯·葛琉斯（Aulus Gellius，约125—180）所撰《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一书的心得体会。葛琉斯生活年代也在安敦朝，略晚于芝诺比乌斯，过去粗览茱卜古典丛书里的这部著作，印象上觉得他就是个追求琐细

学问的冬烘先生。钱说，《阿提卡之夜》类如中国的《蛾术编》、《日知录》，并引该书前言所提及的数十种书目，尽此类学问著作，可见当时风气。不过，这次令我惊讶并感到印象深刻的是，该书有两处谈到了当时教育方面的问题，经由钱一贯犀利的眼光特别拣出，遂知古人的琐细学问掌故间未尝没有“忧世伤生”的寄托。这两处，一处见于 I, ix, “当时后生小子，从师学道而狂妄无知，于函文发号施令，一若示周行而授机宜者”，“札记”里随后抄录了一段拉丁文（sed legem etiam dant que philosophari discant. Alius ait ‘hoc me primum doce,’ item alius ‘hoc volo’, inquit, ‘discere, istud nolo’. 试译作：“他们对于哲学如何教都要指手画脚。有的说：‘先教我这个’；有的则说：‘我想先学这个，不想学那个’”。）。另一处见于 VII, x, “述当日哲学家卑己屈躬，登门往教，如恐不及，而弟子宿酒未醒，为师者枯坐以待……道尽教师苦趣”。这两段文字，令我们想起《围城》描写大学生们的话：“他们的美德是公道，不是慈悲。他们不肯原谅，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这在今天读来依然真切可感，触目惊心。

钱意犹未尽，在读书笔记的补白处又引《希腊文苑英华集》里仅止于描述学生赖教师束脩的句子作为对照，以说明世风的“每况愈下”（这段诗文倒是引得可疑，似乎钱没注意该诗人是 4 世纪人，比葛琉斯还晚 200 年，反以为更早了）。最后，依然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引法国思想家儒贝尔（Joseph Joubert）《沉思录》的话作为结语：“Quand je vois des jeunes gens tels que

ceux de nos jours, je dis que le ciel veut perdre le monde”，“当我目见青年一代如是之举，惟有慨叹上天将毁灭这个世界”。札记应记于六七十年代，钱读书心眼独具，怀抱别出，唯晚年抱持“默存”之念，不再轻易表态，识者自能感通。

（原刊于《嘉源》杂志第二期，2010年6月）

人名难译：从周作人与罗念生的分歧说起

近读止庵《周作人传》一书，谈到 50 年代知堂与杨宪益、罗念生合作翻译古希腊戏剧的事情，引传主 1954 年里的日记云：“杨君还是识者，大体尚妥”，罗氏“所提意见多庸俗粗糙，只可选择而采用之”。周、罗二人的分歧，除了罗念生在《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文中所暗嘲的“职业译者”故而“注解甚多”外，还有一点，今天看来更为重要，就是罗念生主张人地译名当依英美读法，周作人则主张“名从主人”（见止庵书，第 279 页，周作人这一意见至少最早公开发表于 1951 年，参看止庵为《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所作的“跋”）。

仔细分辨两人的意见，颇有值得分析的地方。首先，若云罗氏所谓“依英美读法”，指的竟是英美古典语文学家所推导出的古希腊文发音规则，则周氏的意见就变成了不切实际的“还原主义”，显然就毋庸再议了。那么，罗氏所说的英美规范，当落实在“译名”二字之上。他主张的是中译本应采用英语学术

界已有的翻译惯例，而周作人则认为人地译名要符合古人的本来面目。举个例子来说，罗周二人都翻译过古典晚期一个以希腊文写作的叙利亚人的著作，罗念生将此人名译作“琉善”，他的依据便是英语世界所流行的“Lucian”这个名字；而周作人译成“路吉阿诺斯”，这是按照原本的写法 Λουκιανός 或是拉丁化的写法 Lucianus 译出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在 1991 年曾以“卢奇安对话集”的题名出版过，若按罗念生的标准看，“卢奇安”倒是大体符合德国人的读法了，这不是知堂的本意。

平心而论，两人意见的分歧，可视为关注的角度大有不同。罗念生重视的是目下实际的工作，研究西方古典语言文学之人才稀少，必须借重欧美近世学术的已有成果。周作人的怀抱似有意去除近代西人学术和语言文化的一部分遮蔽，使得中国古典精神能与西方传统更多直接的对话。从这两种态度，可看出二人果然一是专家，一是杂家；一是学人，一是文人。罗氏早年留学欧美，自然知道西方古典学术的深浅，周氏学古希腊文自留学日本时期开始，以后所凭借的多是个人非凡的才能和努力。自罗的眼光看来，周的意见不免迂阔荒唐，以为是文人无行，兼对其注释过多而不满，遂有“职业译者”的诛心之论。而周看来，罗的译学连名称都尚需仰赖于西方近人，便讥为“庸俗”。

那么两人的意见哪个更可贵？哪个更可行？地名翻译的问题在此暂时不去考察了，我们只先看他们二人自己使用的人名翻译：假若周作人彻底贯彻自己的主张，他就应该像改“色诺

芬”作“克什诺芬”那样把我们熟悉的“柏拉图”也改成“柏拉同”，但是并没有。而罗念生的意见自己也未尽遵从，荷马史诗中有两个重名的英雄，英文世界写作 Ajax，而我们看他在无论在《伊利亚特》还是《古希腊语汉语词典》中都并不译作“阿贾克斯”，而是依据希腊文原本的读法翻成“埃阿斯”。虽都只是随手举出的仅仅一个例子，但这反证都不算生僻，足见两位先生都还是有所变通的。

时至今日，翻译西方古典著作或介绍西方文史的书籍渐渐多了。然而，读来读去，发现上述周罗两人的分歧，早已是非常难以解决清楚的矛盾了。固然译者可以依照某些权威机构制定的规范手册来翻译这些专名，但所谓的“权威”、“标准”，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修正的余地。译者不能机械地照搬“标准”、“规范”。近些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有一套《西方文明溯源丛书》，俱是法语世界的古典研究新著，可说是非常有意义。但译者们在翻译古人名号时一部分服从惯例，一部分则“名从主人”，总之，大家并不打算按照罗念生依英美读法的方式再造一个“依法语读法”，这是对的，但这一点并不能真正贯彻起来。比如，《古希腊罗马时期不确定的性别》中，Phlegon of Tralles 被译成“弗莱贡·德·特拉雷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被译成“哈利卡纳苏斯的德尼斯”；《古罗马人的阅读》中，Valerius Maximus 被译作“瓦莱尔·马克西姆”，Apollonius of Rhodes 被译作“阿波罗尼奥斯·德·鲁德”；《古希腊的交流》把 Diodorus of Sicily 译作“狄奥多尔·德·希熙耳”；《古罗马的医生》不仅犯过以上所举出

的几个错误，还给西班牙的拉丁语诗人 Sidonius 翻译了个法国名字“西杜瓦纳”；《古罗马的儿童》同样将 Dionysius 按照法语习惯译成“德尼”；《古罗马人的欢娱》中，译者也给古罗马人造出了一个“古尔热”的法文人名读音来。熟知这些古代人物的读者，看到他们时或顶着个法国人的名号，不免感到有些滑稽，由此反思，即使是用英美的读法习惯来叫那些古人的名字，这种做法，与用汉语的方式称柏拉图为“柏子”、亚理士多德为“亚公”、萨福为“萨女士”相比，难道有什么真的分别么？

此外，古人名号的翻译中，还有一部分属于个人之绰号的情况。并不是指那些人名中本来包含些意思的例子，比如“荷马”可作“人质”义解释，“柏拉图”的意思是“阔壮”，等等。凡是有必要或者意译、或者先音译再给予注释的名号，其性质都属于社会所赋予此人身上的一个“标签”，他人拿来与其原名并列，以方便在文献中进行分别。这些“标签”有的涉及此人出身、籍贯、职业，有的描述此人的仪表、性格、本事，还有的便只是一个赞词或贬词。这个问题往往由于译家的疏忽而仅是对音译出了。常见的一个例子是 Dion Chrysostom，刘小枫已建议译作“金嘴”狄翁，而不能服从英语文献的习惯音译成“狄奥·克律索斯托姆”。Chrysostom 意即“金嘴”，谓其人能言善辩，早期教父时期又有一个 John Chrysostom，也宜译作“金嘴”约翰，但后来 Chrysostomos 变成了专名，不再是绰号的功能了，则只能用音译。希腊化时期西亚北非的塞琉古、托勒密朝诸王多有绰号，如“爱父者 (Philopator)”、“爱母者

(Philameter)”等，杨宪益有一篇《汉初孝的观念传播西方说》，大意言 Philopator 此字与中文“孝”字同义；而汉初孝惠帝的帝号初见于公元前 187 年，正是塞琉古朝的 Philopator 登基之时，遂断言“西亚的希腊诸王用 Philopator 的称号最早不能早于公元前 187 年，此称号在西方普遍流行于公元前 12 世纪间，正当中国的西汉时代”，以为西学中源之依据，此说甚谬。Philopator 义为“爱父的”，实早见于古希腊文学中，欧里庇德斯谓“人皆爱父”(ὅσσιςφιλοπάτωρ, *Orestes*, 第 1605 行)，此字亦可见于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等等。以埃及的托勒密朝来说，其四世 Ptolemy Philopator 在位时即在公元前 221—前 203 年，早在秦始皇时。杨先生偏偏不言此君，唯以公元前 145 年的另一位 Ptolemy Philopator 为例；须知此君之全名应是 Ptolemy Neos Philopator，即是“新爱父者”，乃托勒密六世“爱母者”(Philameter)之子，“爱母者”死时此子尚幼，故被其叔父篡位。僭权之新君复与皇嫂克略巴忒拉二世结婚，并杀害了“新爱父者”。故而也有历史家根本不承认“新爱父者”算得托勒密王朝的一位君主。不仅时间上不足佐证，所谓“爱父”、“爱母”的列王，均为无能懦弱之辈，与中土汉代之以“孝”为帝号的君主，从命意上也有天壤之别。

拜占庭时期的帝王将相、学者文人使用绰号的情况更多，也需要译者去查考其希腊文原名的写法和含义。如“宗座秘书”米迦勒 (Michael Syncellus)、“西奈山人”阿纳斯塔修斯 (Anastasius Sinaites)、“豕猪人”乔治 (Georgius Choeroboscus)、“阶梯”约